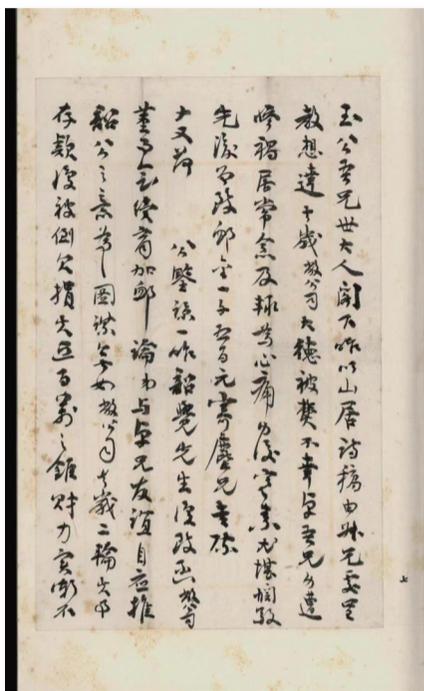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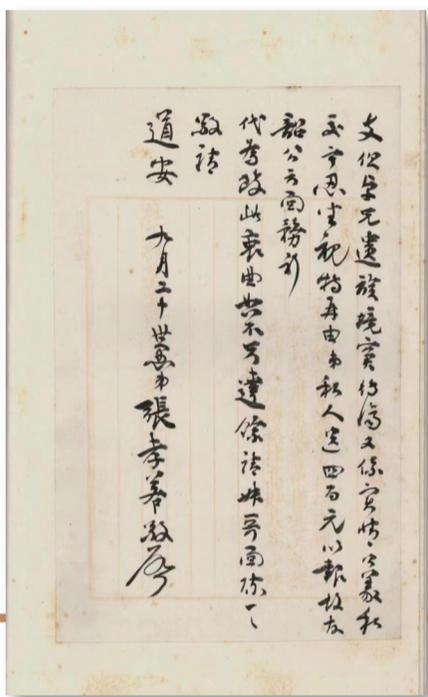


崇川往事

张孝若瞻济沈卓吾遗属

◎赵鹏

最近看到张孝若于1932年9月20日写给叶恭绰的一封信,所言正是瞻济沈卓吾遗属之事。张孝若写这封信的时候,其实也有他难以明言的苦衷和无奈,只能拿出私资四百元来瞻济沈卓吾的遗属,想来也是挺憋屈的。



张孝若致叶恭绰函。

1931年这一年,大达轮船公司够倒霉的。先是3月11日,公司的大吉号轮船在行至如皋境的龙驹沙时忽然失火,全船被毁,船员乘客惨毙200余人,公司损失巨大。到了冬季,南通的得记钱庄宣告倒闭,大达投放在里面的大笔资金血本无归,这对本已捉襟见肘的大达公司无疑是雪上加霜。眼看到了年底,厄运又至,12月13日,大达公司的大德轮由沪往通,在开到太仓境白茆口的七盘沙处,又遭失火被毁,200多条人命葬送于水火之中。

轮船失事已经够惨,偏偏遇难乘客里还有一位名人沈卓吾,并由此引发了更多的社会关注。沈卓吾是如皋人,出身清寒,晚清时曾加入同盟会,追随孙中山,民国后在上海主办《工商日报》,创办《中国晚报》并自任经理,还担任过上海电报局局长、财政部印花税处处长兼江苏印花税局局长等职。1924年,孙中山在广州作讲演,沈卓吾为之录音并制成唱片,保存下孙中山唯一的声音史料。这回他是送岳母等几位亲属由沪返如,不幸就罹了难,那时他还挂着一个铁道部参事的职衔。

据遇救的目击者说,火灾发生时,沈因动员岳母等家属逃离不果,自己携带救生圈跳江,然而此后数日,一直踪影全无,生死未卜。为此,旅居上海的通如崇海启五县同乡会临时组织被难委员会,高额悬赏,征求沈卓吾的消息。另一方面,如皋的

被难家属救济委员会也呈文交通部,指责大德轮船航务废弛,蔑视人命,希望迅予究办,甚至主张停止大达公司的营运。

面对激愤的舆情,时任大达公司董事长的张孝若,虽然远客香港,还是很快发表了一篇《一个白手立业的江北人——悼沈卓吾》,借怀念遇难故友沈卓吾的名义,为公司作了一些解释,成为一种巧妙的“危机公关”。张孝若在文中明确表示:“卓吾还有白发高年的老母在堂,寡妻和弱子都待抚育教诲。岁月方长,当然是我们后死者的责任,义不容辞的。我很想集合了卓吾的朋友叶玉虎、孙哲生、郑韶觉诸兄合力谋画,以慰逝者。还想募集一笔款子,帮卓吾做一个纪念。怎样可以适当而永久,且待与各方友好商榷后再定。卓吾的境遇,在他的朋友中,当然我是最沉痛而心是最不安的。”

据闻大德轮失事两个月后,人们在江滩发现一具面目难辨的尸体,因为从衣袋里看到沈卓吾的名片,这才认定是沈的遗体,地方人士因此为之举行了庄重的安葬仪式。

最近看到张孝若于1932年9月20日写给叶恭绰的一封信,所言正是瞻济沈氏遗属之事,全文抄于下:

玉公吾兄世大人阁下:昨以《山居诗稿》由叔兄处呈教,想达。去岁敝公司“大德”被焚,不幸卓吾兄身遭惨祸,居常念及,辄为心痛。身后寒素,尤堪敬悯,先后曾致恤金一千五

百元,寄尘兄走陈左右,荷公鉴谅。一昨韶觉先生复致函敝公司董事会,续商加恤。论弟与卓兄友谊,自应推韶公之意为之图谋,无如敝公司去岁二轮失事,存款复被倒欠,损失近百万之巨,财力实渐不支。但卓兄遗族境窘待济,又系实情,公义私交,宁忍坐视?特再由弟私人送四百元,以报故友。韶公方面,务祈代为致此衷曲,恕不另达。徐请叔哥面陈一一。敬请道安。九月二十,世愚弟张孝若敬启。

信中提及的“寄尘”,就是负责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吴兆曾,而“韶觉”即郑洪年,他与叶恭绰都曾在北洋时期担任过交通部次长,与沈卓吾相交颇深。至于最末提到的“叔哥”,我觉得应是赵凤昌的公子赵叔雍(尊岳),张孝若和他是兄弟相称的。

张孝若写这封信的时候,其实也有他难以明言的苦衷和无奈。这是因为接连两轮烧毁,公司损失重大,股东们要求追究责任,于是决定改组董事会。其时,上海滩的帮派势力乘机打入,最终由杜月笙出任董事长,而杜的门生杨管北则担任了公司经理,掌握了实权。至于张孝若,则被安排为一个挂名的总经理,到了这个时候,大达轮船公司的实际权力已然旁落在他人手上了。看信中张孝若只能拿出私资四百元来瞻济沈卓吾的遗属,想来也是挺憋屈的。

海陵旧话

赵宗抃宦游浙江

◎赵一锋

赵宗抃擅印,曾刻“宦游两浙二十日”的闲章。可一般认为,他不乐仕宦,以授课鬻字篆刻为业,一生并未出仕,其子赵过之回忆录《悠悠芳草》中也没有宦游浙江记载。如此一来,“宦游两浙”是怎么回事?

《大港赵氏家谱》载,光绪二十九年(1903)赵宗抃江南乡试考取了第二十个举人,援例授文林郎,选知县,浙江候补盐大使,终身不仕。文林郎为清代正七品官员所授予的散官名,七品文官都可以称文林郎,赵宗抃选知县故可称其“文林郎”,但也只是具备了身份。清代乾隆十七年(1752)定制,三科(原为四科,嘉庆五年改三科)不中的举人,由吏部据其形貌应对挑选,一等以知县用,二等以教职用。每六年举行一次,意在使举人出身的士人有较宽的出路,名曰大挑。对照此条件,赵宗抃为新科举人,不具备“大挑”的资格,出仕为官应该是走的捐纳的路子。文林郎是虚衔身份,浙江候补盐大使则是实实在在的职务,笔者曾就此事询问赵宗抃孙赵芝云先生,言父亲曾讲过祖父短暂为官,具体详情也不得而知。

笔者曾采访过掘港老字号饭店广雅楼的后人,无意中得知陈氏姻亲长辈王希昌曾陪同赵宗抃赴浙江盐场大使任。王希昌,生卒年不详,家业饭店,赵曾望弟子。据陈氏后人回忆,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赵宗抃赴浙江宁波任盐场大使,王希昌同行担任幕僚,师兄弟也有个照应。赵宗抃初任为官意气风发,期有一番作为,但晚清官场腐败,积重难返,他难以施展抱负,故上任仅二十天即挂印辞官。后来刻印“宦游两浙二十日”以记录这段经历,不过赵宗抃很少提及这一段过往。这倒是和吴昌硕任安东县(今江苏涟水县)知县一月后辞官,刻印“一月安东令”有几分相似。民国十二年(1923)掘港徐氏请赵宗抃为亡人徐润斋写墓志铭,文末落款为“民国十二年癸亥六月两浙盐大使举人赵宗抃谨撰并书”,两浙即两浙,写两浙盐大使而没有写候补盐大使,是已赴任实缺。

民国二十四年(1935),赵宗抃定居上海后,授课并挂润例于朵云轩,卖字售印为业。其后不久,他已颇有人脉,如同族赵启霖为江苏省民政厅厅长,儿女亲家顾祝同是省政府主席。赵宗抃的许多朋友纷纷来拉关系。有的情不可却,赵宗抃也推荐了一些人,其中有老友胡壶山之子新畲任昆山县财政局长,苏工同事陈玉伦任昆山县公安局长,还有曹鹭渔为上海县县长,秦杰人为邳县县长。但他本人却坚决不做官,仍然青毡自守。